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顾潮
编

顾颉刚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顾潮
编

顾颉刚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顾颉刚卷/顾潮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0-18429-6

I. ①中… II. ①顾…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顾颉刚 (1893~198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427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顾颉刚卷

顾潮 编

Gujiega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8.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7 000	定 价	64.00 元

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

导 言

—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以号行。江苏省苏州市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助教、讲师，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所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先生出生于读书世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在传统学术方面具有良好的根基。他读书时不肯盲从，爱以自己的眼光去评判。读书之余饱听家人讲故事及苏州掌故，由此启发了对历史的兴趣，并开始接近民间的故事传说。当时正值清代国势岌岌可危之际，传统学术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随着国内革新运动的勃发，梁启超、章太炎对传统学术和文化重新估价。先生少年时代先后从《新民丛报》、《国粹学报》中读到梁、章二人之文，他们的批判意识，特别是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思想，由此深植先生心中。苏州是清代汉学中心，玄妙观中旧书肆众多，先生每日放学后都去翻览，遂将眼光放得很大，不屑做书本上一家一派的舆台。他从《国朝先正事略》之《阎若璩传》中得知，其已辨明《古文尚书》是魏晋间人所伪造，又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得知，其将自己曾读过的《汉魏丛书》里不少书列为伪书，这使他思想产生巨大震荡，深感古书中问题之多，立志以毕生之力去考辨。

1913年春，先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一度迷恋京戏，因留意戏中的故事而领略了故事变化的格局。听章太炎讲学，得知今、古文经学的分歧，愿从章氏“六经皆史”之说，并受其攻击今文家“通经致用”之启发，有了自觉治学的意志——为求真而治学。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其将三皇五帝时代视为“传疑时代”的眼光很佩服。又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得知上古史靠不住，并知今、古文家各有其是非。1916年秋，先生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不久，蔡元培任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聘陈独秀、胡适任教，使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鼓吹思想革命；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丢开唐、虞、夏、商而自周代始，对人们充满三皇五帝的头脑产生极大冲击。同学中又有傅斯年勇于批评。先生受他们的鼓舞，敢于大胆宣布胸中积蕴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1918年，北大教授征集歌谣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陆续发表，使人耳目一新。受此启发，先生开始搜集家乡歌谣，并对连带得到的风俗材料加以注意。

1920年，先生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跟随胡适整理国故。读胡适《〈水浒〉序》及其论辨井田之文，承受他“历史演进”的研究方法，并认识到研究史学也可以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协助胡适考证《红楼梦》，为“新红学”的开创作出贡献。受胡适、钱玄同影响，对编辑前人辨伪材料很感兴趣，标点《古今伪书考》、《四部正讹》、《诸子辨》、《崔东壁遗书》等，辑录《诗辨妄》。1922年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时，研究《诗经》、《尚书》、《论语》中古史资料，发现禹的传说西周时就有，尧、舜是到春秋末才流传起来，伏羲、神农更是到战国时才出现，从这种演化上发现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之次序和排列之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次年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念，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层累说”指出了尧、舜、禹等古史传说中的帝王有神性的问题，动摇了中国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在学界引起一场大论战。在论战中，先生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四点传统观念。后将此次古史论辨的有关篇章集结为《古史辨》第一册

于1926年出版，并撰六万字自序，从时势、个性、境遇等几方面畅言自己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以及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此书在学术界及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胡适称“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此后十余年间，先生及其师友陆续编辑出版《古史辨》至第七册，共收文章三百余篇，字数达三百余万。从此，“古史辨学派”这一重要的史学流派遂闻名于世。

在北大工作期间，先生又任后期《歌谣周刊》以及由此扩张而成的《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编辑，便于接近民众材料。他以孟姜女故事的变迁论证古史中传说的演变，以歌谣论证《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以考察东岳庙诸神及妙峰山香会来探讨古代神道和社祀，都是在古史研究中加进了许多新材料，而且在我国民俗学这一新领域中做了许多工作。他整理家乡歌谣编成《吴歌甲集》作为北大歌谣研究会第一部专集出版，其中包括他以歌谣与《诗经》作比较研究的《写歌杂记》以及师友的研讨文字，从而使此书成为我国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又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用史学的方法和精神去研究社会上一向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故事，引起巨大反响，使该故事成为数十位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讨论的内容均由先生编为《孟姜女专号》在两《周刊》陆续刊出。所作《孟姜女故事研究》，依照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对该故事两千年来的演变及其在全国各地不同的流传进行阐释，被称为“奠定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基础”（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还与北大风俗调查会同人到京西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归后作《妙峰山的香会》，并连同他人的调查所得编为《妙峰山进香专号》发表。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这些工作均为我国民俗学的开创作出了贡献。

不久先生南下任教，将民俗学运动由北京推进到南方。1927年在中山大学发起成立“民俗学会”——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刊行民俗学会丛书，主编《民俗周刊》，在该刊《发刊辞》中提出：“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此文被当今学术界称为“我国民俗学运动的一篇宣言书和动员令”（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并且若非放在《民俗周刊》之内，就会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杨堃：《关于民俗学的几个问题》）。可以说，先生

以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新史学作出了独特创建，又以新史学家的眼光和手段使我国民俗学在发端及奠基之时即立于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

1929年先生北返就燕京大学教职，两年后又兼北京大学教职。所编《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即是依《诗经》、《论语》、《尧典》、《国语》、《左传》、《山海经》、《史记》等古籍厘清传说中古史的演变过程，进一步阐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编讲义过程中产生了“古史四考”的宏大计划：《帝系考》为三皇五帝的来源，《王制考》为三代制度的来源，《道统考》为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经学考》为辨经书的构成及经学的演变。在此设想下，抗战前的数年间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又将此文的一部分改写为《汉代学术史略》，后改题《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三皇考》、《尧典著作时代考》、《两汉州制考》、《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说出于墨家考》、《九州之戎与戎禹》等。

在“古史四考”的工作中，先生对《尚书》所下工夫最深，因为它是两千多年来最受儒家尊崇的经书，在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均起了关键性作用。先生认定，要从这四方面清算古史，就必须攻破《尚书》这一首要堡垒，使其从“圣经”地位恢复到史料地位。此前于1925年，先生已作《盘庚》等篇的今译发表。接着陆续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开“《尚书》研究”课，搜集自汉至近代研究《尚书》的主要各家之说，编成《尚书学参考资料》八册；又编《尚书研究讲义》甲乙丙丁戊五种，每种再分若干册；还主编《尚书通检》，并与顾廷龙编辑《尚书文字合编》。这些资料和讲义已成为《尚书》研究领域最根本的物质建设。对其中《尧典》、《禹贡》两篇，先生下工夫尤深，认为《尧典》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晶而将其史事化，《禹贡》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由当时地理学家所作总结性记载，将此二篇的写作年代移至战国前后。这一成果得到学界称许，徐旭生认为：“疑古学派最大的功绩，是把《尚书》头三篇的写定归之于春秋和战国的时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吕思勉认为：“发明《禹贡》不但非禹时书，所述的亦非禹时事，乃后人据其时的疆域附会，则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

先生为考辨古史古籍，十分重视古代地理的研究。1928年在中山大学开“古代地理研究”课时，即搜集古籍及甲骨、金文中三代地理资料，一一加以按语，编为讲义。1934年在大学讲授《禹贡》时，联合

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讨论内容包括古代及当代的地理沿革；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研究内容由沿革地理转而侧重边疆地理与民族演进史。在其率领下，仅一年多时间该刊便成为社会上颇有声誉、地位的学术刊物。接着又成立禹贡学会，编印《地图底本》，出版《边疆丛书》，组织边地考察团。该学会在三年中取得巨大成绩，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堪称盛事，其中《禹贡半月刊》至七七事变停刊时，共出版7卷81期，造就了“禹贡学派”。先生通过这期间的努力，开创了我国历史地理学、边疆和民族学，为新兴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影响深远。因此《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卷首曰：“我国当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在先生倡导下开展起来的。”

抗战期间由于生活动荡，先生难以作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学问不仅在书里，从实际生活里也能发现许多可以纠正前人成说的材料，于是借考察边疆教育、调查当地民族与社会现状的机会，以所见所闻之边疆状况证中原古史，“足以破旧立新，较之清人旧业自为进步”（《顾颉刚读书笔记》）。比如途经甘肃临夏小积石山，遂证之《禹贡》“导河积石”必为此山，而非历来所认定之今青海积石山；又如见边地遗堆而追溯古边墙，见江上浮桥而明了古时造舟为梁及方舟而济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所写《浪口村随笔》以及60年代由此改写的《史林杂识》中，此类论述不胜枚举，因而被学界评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汪宁生：《论民族考古学》）。由此可见，先生考辨史料，已跳出了以古书论古书的圈子，除了运用历史文献及考古成果之外，还运用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资料和方法，较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资料范围和方法上均有所扩展。

1954年起，先生在北京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并深入研究《尚书》。1959年起，先生集中力量于《大诰》篇，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成70万字巨著，其中《尚书大诰今译》（摘要）于1962年发表，史事考证部分于逝后陆续发表。他以唐石经为底本，把各种古刻（汉、魏石经）和古写本（敦煌、日本古写本）逐一校勘，将误字、衍字、脱字甚至错简改定；再选取古今人的注释，打破今、古文和汉、宋学的藩篱，而且偏重近代，因为时代愈近，比较材料愈多（宋人释经注重语气，清人释经注重语法，近来又注重甲、金文和经典之比较），愈能推翻前人误说而建立近真的新说；将解释妥当的文字加以分段、标点，再译为现代汉语；然

后考证文中的历史事件，以了解古代的真面目。先生对《大诰》的考证，上及传说时代和夏代，下及春秋战国，将此篇的历史背景即周公东征管、蔡、武庚这一关系周王朝成败的重大事件论证清楚，发掘出周初民族大迁移的重要史实，揭开周公“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假象，并通过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全面清理，揭示了古代东方大民族——鸟夷族的组成、分布及兴亡。先生这些成果体现了当时《尚书》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对商周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学界称赞。杨宽认为：“顾先生这样做，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见《尚书核诂序》）这真是古史领域里的重大建设。不但便于学者充分运用《尚书》以建设商周史，还便于用《周书》与西周金文作比较研究。”（《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许冠三认为：先生后期对《尚书》的研究是“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而写出的“一生最圆熟的谨严之作”，“不但会通了汉魏以后各类专家学说的精华，而且抉择准当，论断公允，其疏证之详明精确与绵密细致更在王国维之上。至于资料繁富、体例创新与双重证据配搭的挥洒自如，犹在其次”，并认为“顾氏所以有此空前创获，关键仍在方法，文法语意演进观点的运用尤为成功”（《新史学九十年》）。

二

在先生一生学术业绩中，以《古史辨》的影响最为深远。20 世纪末，北京国林风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影响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收入中外名著 105 部，《古史辨》名列其中，作者称这部“以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反映了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史学界在考订我国古代史料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古史辨》的问世，首先应归功于那个时代，正如先生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以下简称《古三序》，余同）中所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许我们比宋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道统的束缚；也许我们比清代学者作进一步的探索——解除了学派的束缚。它又给予我们许多崭新的材料，使我们不仅看到书本，还有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可以作种种比较的研究，可以开出想不到的新天地。我们不敢辜负这时代，所以起来提出这些问题，激

励将来的工作。”先生在北大求学和工作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理性不受宗教迷信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使人对古书增加不信任的意念。在这种时代风气中，先生思想得以解放，他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古一序》）这种由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独立人格，是现代学者与传统学者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因为先生具备此种人格，才能够“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同上）；并敢于将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和高文典册中的经学、史学以及古器物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题材，正如他所说：“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同上）这就不仅打破了道统和家派的束缚，而且连雅俗的鸿沟也填平了。

先生考辨古史，从远的来说是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对古书古史的疑辨传统，尤其是宋代郑樵、清代姚际恒和崔述（东壁）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是受了康有为、胡适、钱玄同三人的启发。他说：“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康有为受西方历史学家考定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在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作伪的原因。这使先生读后“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古一序》）。胡适学了西方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不把一事物看作孤立和固定的，而视为有前后联系（即因果关系）和变化的，以此种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古代制度、学说和故事，如井田制、《水浒传》等。这就使先生认识到“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同上）。同时，胡适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去研究故事，使先生联想到以往当戏迷时的体验，触类旁通，便以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古史中的神话传说，因而他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顾颉刚自传》）钱玄同从章太炎习古文经学，并从崔适习今文经学，而又富于批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来谈今古文问题，主张用古文家合理的

话来批评今文家，同时用今文家合理的话批评古文家，使他们原形毕露，让后人不再投入他们的家派。先生由此认清一个目标，即治经学是要将其材料全部变为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做经学的结束者。他说：钱玄同“给我以研究的题目”（同上）。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当时先生与胡适、钱玄同在讨论古书古史真伪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假说，“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一个真正的创造”（袁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说”的产生受到崔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启迪，然崔氏的说法仅描述了历来古史系统的现象，而先生的“层累说”却反映出古史系统变化的一些规律。他以历史演进的方法，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现象中，得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并且“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规律。又从“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现象中，得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规律。这些都较崔氏的说法有所深入。“层累说”的第三点：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则更是崔氏所未言及的。随后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将“层累说”又继续发展，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应依古代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应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应懂得五帝、三皇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这四项标准，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据，远远超过崔述“考信于六艺”的信条，直至今日仍没有